

## 中华文化认同演化格局中的西部记忆\*

白 浩

**摘 要:**对中华文化格局的划分一般均以南北而论,这掩盖了东西划分的存在。中国古代史,尤其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的历史上文化中存在东西二分的格局划分。东西二系相抗相融,但文化一直是东系的优势,正因如此,西部一直未得到文化上的重视。东西格局向南北格局演化的关键时期在秦汉。其后中华文化的内部族群认同融汇历程中,内部的族群分异仍存,认识到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认同传统观念的存在,才能理解许多西部文化与文学现象。

**关键词:**文化认同 东西格局 西部

DOI:10.13760/b.cnki.csa1t.2019.0012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格局中,其实一直并未构建起西部文化及西部文学这样的主体概念,论文化及文学,均以南北划分,如南北文化特质、南北学派、南北文学特质等,如刘师培<sup>①</sup>、梁启超<sup>②</sup>、袁行霈<sup>③</sup>等先贤。如此格局,一则源于中国独特的地貌对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几大重要水系——黄河、长江、淮河等均是自西向东流,成为划分南北的天然壕堑,这不仅是地理的划分,也是生活方式、社会形态的划分。对此,《毛诗》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魏志》曰:“文帝伐吴,至长江而叹曰:‘天固以限南北也。’”<sup>④</sup>二则源于长期的政治征伐和割据,它反过来强化了南北天堑的分隔,典型者如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当代西部文学发展的身份记忆与世界性研究”(项目编号:08XZW016)成果。

①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31—763页。

②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97—722页。

③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三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第33—47页。

④ 《太平御览》卷六十《地部二十五·江》(第1册),中华书局,1960年,第289页。

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一方面长期的政治割据造成从政治制度到生活方式、文化思想的区隔界线，另一方面江河也成为人们的心理分界线，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化主体认同圈。在古代生活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江河成为生活生产的主要依靠对象，它一方面可以提供方便的饮用水源，同时为农耕提供方便的灌溉资源，再则也为不发达的交通提供航道，因而，依存于江河自然形成不同的文明形态，黄河、长江这两大水系便成为南北文明两大体系的自然代表。由于3000年前的黄河流域气候条件相当于现今长江流域气候条件<sup>①</sup>，因而黄河流域先行成为文明中心，而长江流域则被视为“南蛮”，其后因为气候变冷，文明中心明显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南北对举的格局得到强化。

然而，这种文化格局的南北划分掩盖了一个问题，那便是东西划分。其实，所谓南北划分，主要针对东、中部地区，而少涉及西部，这说明了文明东移的事实，所以，西部生活及文化被遮蔽了。由此产生系列问题：西部何以被忽略？此现象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为何？作为独立文化主体的西部可曾存在于历史的某个时段？西部这一概念本身的主体范畴有无迁衍变化？西部的地域特征、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特征如何？重提西部及西部文化、西部文学有无必要，有何意义呢？

## 一

如前所述，历来文化文学论者皆以南北而论，少有言东西者，其中反拨潮流之罕见者为王国维、傅斯年二先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均提出中国历史文化的东西二分观点，为西部之存在正名，然细读之则会发现，此“东西部”系古代史范畴，尤指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此阶段之文明主体，范围何在？由此而生对“中国”“夷夏”等本源概念的探究。“中国”者，指中原也，其范围大致在黄河流域。按傅斯年考，严格意义的夏“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乎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邱，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sup>②</sup>。而与夏对举的夷则“现在假定，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今山东全省境中，及

<sup>①</sup>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节选）》，见葛剑雄、华林甫编，《历史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3—77页。

<sup>②</sup>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2页。

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皞、少皞,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做夷。《论语》有九夷之称,明其非一类。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斗争”<sup>①</sup>。一方面,诸夏之外的异族东称夷、西称戎、南称蛮、北称狄,另一方面,夷又成为异族的总称。<sup>②</sup>即便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而言,历三家分晋、楚吞吴越之变化,强盛如东之齐、西之秦、南之楚,也不免被鄙薄为夷、戎狄、蛮之类。长江流域之南,尽被目为南蛮。傅斯年考:

《荀子·儒效篇》云:“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楚夏对称,自不能以楚为夏。楚国之最大版图中,尽可包含一部分诸夏,而诸夏未必能过荆襄而括江汉,或者此之名夏竟是同音异辞。陈范记关羽据荆州北伐曹操事云:“威震华夏”,是汉末犹以华夏为三辅三河汝颍等地之专名,未尝括九州而言。……则以古代河济淮泗的中国全部论,夏实西方之帝国或联盟,曾一度或数度压迫东方而已。与商殷之为东方帝国,曾两度西向拓土,灭夏克鬼方者,正是恰恰相反,遥遥相对。<sup>③</sup>

至商,“汤放桀,等于夷灭夏。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商人被周人呼为夷,有经典可证。”<sup>④</sup>至周,周起于西土,周武伐纣,从其牧野决战前的誓词《牧誓》看,“逖矣,西土之人”,“及庸、蜀、羌、鬻、微、卢、彭、濮人”<sup>⑤</sup>,这其中,西土八国中的庸、蜀、卢、彭、濮五国都在汉水流域,羌、微在渭水流域,鬻在山西西南端黄河北岸,以此观之,其实周之“西”亦在后来的中原之范围内矣。傅氏虽承认夏商周的东西二系说,但他也同时认为“这样的东西二元局势,自非混合不可”。

三代中东胜西之事较少,西胜东之事甚多。胜负所系,不在一端,或

①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3页。

② 《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四《四裔考一·东夷总序》有云:“东夷有九种,曰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元夷,风夷,阳夷,于夷,率皆土著(迟略切),嘉(许利切)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曰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文献通考》(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547页。

③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2-213页。

④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0页。

⑤ 《尚书正义·周书·牧誓》,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页。

由文化力，或由战斗力，或由组织力。大体说来，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优。在西方一大区兼有巴蜀与陇西之时，经济上有了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骄，是不易当的。然而东方的经济人文，虽武力上失败，政治上一时不能抬头，一经多年安定之后，却是会再起来的。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sup>①</sup>

夏朝在文化上的贡献何若，今尚未有踪迹可寻，然诸夷姓之贡献都实在不少。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之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賡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sup>②</sup>

东部平原地区之文化中心鲁“土著之伊尹，用其文化所赋之智谋以事汤，遂灭夏。此地土著之孔子凭借时势，遂成儒宗”<sup>③</sup>。正因为对于东夷的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视及对“诸夷姓”的细考，傅氏被后人议为有“东方主义”倾向或东夷情结。<sup>④</sup>

东西如此二系相抗相融，但文化一直是东系的优势。周自西徙东，且又礼失而求诸四夷，鲁成为崇周礼的文化中心，齐举尊王攘夷政治大旗，诸子百家本就多出于山东中原，齐之稷下学宫成为文化交流中心。这种文化格局至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彻底认定以儒家为代表的东部文化为整个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统治支柱。要言之，东汉以前，中国以东西二系的分离对抗和交融为基本格局，东西二系的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其中军事政治上西胜而文化上则是东强，正因如此，西部在文化上一直未得到重视。即如太史公所云：“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sup>⑤</sup>然“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sup>⑥</sup>，在商鞅行耕战之法，以严刑峻法治国而国富兵强之后，这种文化歧视在纵横时代体现为六国对秦“虎狼之国”的称谓。在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后，“焚书坑儒”也给秦国招来“灭文化”的罪

①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7页。

②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3页。

③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9页。

④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9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686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

责。贾谊《过秦》统之曰：“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sup>①</sup> 集录《战国策》的西汉刘向也同样愤然责曰：“杖于谋诈之弊，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sup>②</sup> 建立一统天下伟业的秦帝国尚且被屡屡推上文化的鞭尸柱，中华文化中有华夏认同，有崇周文化，有汉族认同，有唐人认同，可是却缺少对秦的文化认同，对于曾以最残暴的武力征服山东六国的秦之否定，足以体现文化主导权的东部化。对此，傅斯年曾归纳说：“统一中国之国家者——秦。统一中国之文教者——鲁。统一中国之宗教者——齐。统一中国之官术者——三晋。”<sup>③</sup>

除傅斯年，坚持中国古代民族族系的東西划分的还有徐中舒、杨宽等人。<sup>④</sup> 而2012年学者易华更在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夷夏先后说，认为“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为东亚土著，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人西来，传播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三代之前尽是夷，三代之后都成夏”，“战国时代纷纷号称诸夏，夏由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夷由‘人’变为了‘他人’，夷、夏完成了人称和时空的转换”<sup>⑤</sup>。易华的西来说固然尚待争论，但对于上古史起源中的东西划分之大势则进一步得到确认。

尽管有人考证“所谓‘诸夏’的中心夏商周三个种族也是从夷狄之族进化来的”<sup>⑥</sup>，并批驳曰“三代民族既然皆本非中原之人，然则那里还有‘夷，夏’之分，既无‘夷，夏’之分，则以‘华夏’民族居中央，夷蛮戎狄分居

① 贾谊：《新书》卷一《过秦》，卢文弨校，中华书局，1985年。

② 《战国策》序《刘向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3—4页。

③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9页。

④ 参见祁庆富著《西南夷》引童书业《“姬姜”与“氏羌”》：“近年论中国古代民族史的人，有古代民族以东西分而不以南北别的说法，认为汉族实为古代东西二大族的混合体，此说创始于徐中舒等，到杨宽而更详尽，杨先生以殷、淮夷、徐戎、楚、郟、秦、赵等为东系民族，周、羌、戎、蜀等为西系民族。”当然，祁庆富先生是不同意此说的。祁庆富：《西南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⑤ 易华：《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年，封底，第72页。

⑥ 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见葛剑雄、华林甫编，《历史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23页。

东南西北的观念，自根本失其依据了”<sup>①</sup>。这种辨析固然可以探幽发微以驳成见定论，但毕竟已不能改变漫长历史中早已成形的关于族群认同的文化定见了，即便那些定见是以讹传讹，它也已载于典籍，成为历史记忆，树于朝堂，又不断规制着历史进程。那定见就是三代民族经历东西对抗和交融同化后，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这种文化系统中核心的成分之一便是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尽管夷与夏的具体边界在不断地变化，有夏吞夷、夏化夷，也有夷入夏、胡乱华，最终夷与夏的具体政治边界很难再划分清楚，但毕竟夏与夷作为核心概念成了族群认同、文化传承的支柱，夷与夏的界线在汉朝也确定下来，这就是华夏认同向汉族认同变化的原因。<sup>②</sup>其时，汉族早已融入多个戎狄蛮夷的族别血缘了，所以汉族的族群认同便只能是弃血缘而守文化，只能是一种对夏的文化认同了。钱穆所谓“因此文明可以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sup>③</sup>。但即便在汉之后，也仍有夷与夏的斗争，李济便列举出公元1644年以前的三次北方大入侵：匈奴—鲜卑入侵，契丹—女真人入侵，蒙古入侵。<sup>④</sup>其对应时间分别为公元304—580年，公元907—1235年，公元1280—1368年。<sup>⑤</sup>历史上对此习惯的对应代称则分别为永嘉之乱、靖康之变、蒙元王朝。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入侵与改变，除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等外，即便是统一的少数民族统治之大王朝也有蒙古族的元朝、满族的清朝、有近半鲜卑血统的唐朝。但为何元朝武功最为卓著，统治时间却最短，而唐朝、清则统治长久，并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而唐甚至成为古代中国文明的繁盛顶峰呢？核心便在于唐、清两朝推行汉文化，因而获得了

① 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见葛剑雄、华林甫编《历史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第324页。

② 刘师培曾考“汉人”之称所自来：“今世称中国人之汉人，习故言也，自古已然。《隋书·西突厥传》：‘崔君肃曰，吐谷浑亦因憾汉故，职贡不修。’‘汉’，即隋也。《新唐书·郭震传》：‘国家往不与吐蕃十姓四镇而不扰边者，顾天时人事两不谐契，所以屈志于汉，非实忘十姓四镇也。’又《张说传》：‘禄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国忠曰：‘禄山有军功，然而不识字，与之恐四夷轻汉。’‘汉’，即唐也。宋元以来皆袭此称，从所习也。”刘师培：《汉人之称所自来》，见李妙根编选，《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③ 钱宾四（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41页。

④ 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8页。

⑤ 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01页。

汉族群体的认同和接受，而元朝则以对汉族生活方式和文化体系的排斥而激起汉族的持续反抗。

## 二

东西格局向南北格局演化，关键时期在秦汉。秦统一历程中的纵横时代，横为秦与黄河流域中原各国之联合，纵则是长江流域的楚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各国的联合，苏秦言“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sup>①</sup>，张仪言“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sup>②</sup>。《史记》所录苏秦、张仪列传皆大致记于《战国策》中。“公元前3世纪，秦国成北方之雄，楚国为南方之长，秦楚战争把古代东西对峙的情势改变为南方与北方、长江与黄河间统一中国的战争。”<sup>③</sup>拉铁摩尔称此变为“南方——中国第二中心的兴起”。这算是南北格局的初现。而南北争雄到东汉末期演化成了新的格局：“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sup>④</sup>“到了东汉，长江流域才普遍的发达。到孙氏，江南才成一个政治组织。从此少见东西的对峙了，所见多是南北对峙的局面。”<sup>⑤</sup>三国的南北对峙经晋短暂统一后，便进入了南北朝的大乱局，从此，南北对峙强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分流格局奠定下来。自是以后，世人论则南北，再不提西东，而其实是淡化甚至修改了西部的文化记忆。经汉朝的文化整合，在汉之前的周、秦等西部文化已经被铸入整个中华文化体系的主干之中，如同之前春秋战国的“东夷身份”被淡忘一样，秦于西部的戎狄身份作为东西之争中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而搁置，竟至于不再追究了。因此，时间以汉为界，空间具体以秦汉所筑长城为界，产生了新的“西部”概念，那便是新的戎狄，具体包括西北的匈奴、突厥、羌、吐蕃，西南的西南诸夷。就今天的地理区划来说，陕西已被纳入汉文化主体，甘肃被视为“过渡地带”，而西藏、青海、宁夏则属“西部”文化，至于新疆则是更遥的“西域”，自汉张骞始通。属于长江流域上游的巴蜀在秦时被视作蛮夷，后来

① 《战国策》卷十四《楚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18页。

② 《战国策》卷十四《楚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18页。

③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④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8页。

⑤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7页。

随其发展同化而被纳入中华文化的“汉族文化圈”，但川西诸羌则在此之外，滇、黔则分别以“南诏国”“夜郎国”为代表而被视为夷，广西也以交趾州之越夷而为羁縻。但总体而言，西南夷进入“汉族文化圈”时间较晚，三国诸葛亮尚“南抚夷越”，经隋唐拓土的扩大设治，后又有“宋挥玉斧”的隔绝治理，加之山地阻塞导致的治理教化难行，因而历来被视作文化边缘之地而未得重视。

中华文化族群认同历程中，周铸华夏认同为第一次大熔铸，汉铸汉族认同为第二次大熔铸，那么，此之后至清，汉族与其他诸族的族群认同与文化大熔铸便一直未能实现。有论者认为，在清末开始的面对西方列强入侵而形成的中华民族认同是新的—次族群身份认同的大融铸。

时至今日，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西部省区，这是西部文化格局的一大基本特征，因而理清其民族认同文化传统便显得尤为重要。

西部的陕、甘、青、宁、新、蒙、云、贵、川、渝、藏、桂 12 省区市除陕西外，都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其中的 5 个自治区和云、贵、青 3 省被习惯称作民族八省区，也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西部的居民中，包含着中国的 56 个民族成分，并且是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世居之地，在中国的 55 个少数民族中，除了满、朝鲜、黎、畲、赫哲、高山等几个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聚居区都在西部。或者换言之，中国的 55 个少数民族有 49 个主要聚居于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构成中国西部地域的主要成分。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西部地区主要是民族地区。<sup>①</sup>

只有充分考虑到西部地区的民族文化认同的传统观念的存在，才能理解许多西部文化与文学现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西部文学概念时，提议者将其区域划定为西北的甘、青、宁、新、藏，而不要地理上明显居于西部的陕。原因便是在族群文化认同的潜意识中，陕早已为汉文化之主体，而甘、青、宁、新、藏则仍保有“西部”身份。这样的“西部”为汉以后之西部，而非夏商周三代之西部，实为三代西之又西矣，为汉文化主体之外的西部，而非之内的西部。而西部文学概念起初也并不包括西南诸省，由此可见，即便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样的新时代，也仍然潜隐着习焉不察却又根深蒂固的族群文化认同老格局。

#### 作者简介：

白浩，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sup>①</sup> 彭岚嘉、陈占彪：《中国西部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35—136 页。